

DEGUO LIANBANG ZHENGZHI
JIAOYU ZHONGXIN FAZHANLISHI
YANJIU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发展历史研究

阮一帆 著



人民出版社

DEGUO LIANBANG ZHENGZHI
JIAOYU ZHONGXIN FAZHANLISHI
YANJIU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发展历史研究

阮一帆 著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孔 欢 谭 牧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版式设计:姚 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阮一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

ISBN 978 - 7 - 01 - 015623 - 1

I . ①德… II . ①阮… III . ①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研究-德国

IV . ①D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625 号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

DEGUO LIANBANG ZHENGZHI JIAOYU ZHONGXIN FAZHANLISHI YANJIU

阮一帆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41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623 - 1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由
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科培育计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摇篮计划”
资助出版

序 言

张耀灿

德国政治教育，在拥有深厚传统的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二战之后，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进程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外力下的政治体制建构与内在的政治文化建构的落差及其协调发展。出于经济重建、地缘政治理想、文化反思诸多因素以及在东西方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考量等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学者都意识到要迫切通过自上而下、系统的民主政治教育，在没有多少民主传统的德国形成一种现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文化。经过约 30 年的不懈努力，与战后德国经济、政治、外交各方面成就交相呼应的是，其政治教育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效果，德国人民对本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仅仅将其归结为政治教育的因素，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学人，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德国政府和执政党是如何构建其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其核心要素是什么？政治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又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而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阮一帆博士的专著《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这一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核心机构为研究对象，以战后德国由传统臣服型、权威型政治文化向现代西方民主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变迁转型为研究背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发展嬗变，从政治教育视角提供了一个西方社会中成功的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案例，更从一个

机构发展的独特维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战后德国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变迁演化的历史画卷。

本书既是一本史学著作,又是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两个学科的交叉互融,使得本书较好地克服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的一些弊端。从国内现已出版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国别与比较研究的成果来看,大多限于介绍他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时期的一般情况,读者较难把握其前因后果。本书贯通了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政治教育历史,从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教化”、占领时期盟国的“再教育”、1952年“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1963年“联邦乡土服务中心”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一直讲到统一前后的政治教育“东扩”。这无疑对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背景下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作较为完整的宏观把握是十分有益的,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认识其发展特点和变迁规律。

本书的主要特色还集中体现在:1. 作者运用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兼及不同语种文献,在充分了解和分析中外学界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演变和基本活动,在历史叙事中反映了德国政治教育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演进线索及其互动效应,这对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而言,有创新补阙之效。2. 一些论断,如“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解决政治认同或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文化变迁与转型的过程,是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相互促进、协同演化的过程”以及德国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如“构建国家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形成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都能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启迪和借鉴。当然,这些观点和经验还需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总结、充实、完善。

政治教育,是人类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着一般规律。迄今为止,国内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但将政治教育从中单独抽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正因如此,在我国尚属新兴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更需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有益经验。这也是本书

的重要价值所在。必须指出的是,对德国政治教育的研究应该始终以批判地借鉴为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共同的价值取向。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德两国国情差异极大,尤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为甚,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借鉴研究中,要特别考虑这些差异,要始终明确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观点、实践经验与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现实要求的关系。“放眼世界”归根结底是为“立足中国”。

衷心期望也相信阮一帆博士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国别与比较研究方面继续深入下去,创造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源起	(19)
第一节 魏玛共和国的“帝国乡土服务中心”	(19)
一、《魏玛宪法》与“帝国乡土服务中心”	(19)
二、“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	(22)
三、魏玛政治教育的失败原因	(26)
第二节 纳粹时期的政治教育思想体系	(28)
一、以纳粹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	(29)
二、以“种族纯洁”和“对外扩张”为价值取向	(33)
三、以培养“顺从的追随者”为根本目标	(35)
四、对纳粹政治教育的评价与反思	(38)
第三节 占领时期盟国的“再教育”及其影响	(39)
一、“再教育”政策的提出	(39)
二、“再教育”政策的实施	(42)
三、“再教育”运动的影响	(47)
第四节 围绕“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的争论	(49)
一、与美国的政治教育主导权之争	(50)
二、联邦议会有关“宪法保护”的辩论	(52)
三、“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归属之争	(55)

第五节 小结	(58)
第二章 建立初期：“弗兰肯时代”(1952—1968) (60)	
第一节 弗兰肯与“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创立	(60)
一、弗兰肯及其同事	(60)
二、成立之初的组织机构	(65)
第二节 “民主与欧洲思想”的传播	(69)
一、反共产主义宣传与合作教育	(69)
二、50年代政治教育的社会影响.....	(74)
第三节 州一级乡土服务中心的发展	(76)
一、巴伐利亚州政治教育中心	(77)
二、黑森州政治教育中心	(80)
第四节 从“乡土服务中心”到“政治教育中心”	(82)
一、“更名”与影响力的扩大.....	(82)
二、“合作教育”向“冲突教育”的过渡	(87)
第五节 小结	(90)
第三章 发展时期：“变革的年代”(1968—1982) (93)	
第一节 民主政治教育的“再定位”	(93)
一、1968年联邦议会大讨论.....	(93)
二、咨询委员会与政治教育专业化	(97)
第二节 机构改革与《指导方针》的出台	(99)
一、施特尔肯与董事会的建立	(99)
二、《指导方针》与政治教育制度化	(105)
第三节 民主政治教育的新尝试	(108)
一、“争论”与“批判”引领变革	(109)
二、政治教育方式的新发展	(113)
三、“变革”与“稳定”的冲突	(120)

目 录

第四节 与极端主义的斗争	(126)
一、机构内部的反极端主义	(126)
二、对极端主义的研究	(131)
三、反纳粹主义特别项目	(135)
第五节 政治教育的合作者	(138)
一、“合作伙伴”的合作与分歧	(138)
二、与政党政治基金会的合作	(144)
第六节 小结	(149)
第四章 收获时期：“巩固与扩展”(1982—1990)	(152)
第一节 政治教育的保守化	(152)
一、政党政治下的权力之争	(152)
二、对“东部论坛”的监督与控制	(159)
第二节 民主政治教育的新主题	(163)
一、反“公民运动”与“民族认同”	(163)
二、“公共关系”与“环境保护”	(167)
第三节 理论探索的“多元化”	(171)
第四节 民主政治教育的“东扩”	(177)
第五节 小结	(182)
结语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
参考文献	(192)
资料一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公告	(204)
资料二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专业工作指导方针	(207)
资料三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东部论坛公告	(212)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

资料四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公告 (214)

附录一 战后德国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转换及其启示 (217)

附录二 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变革

..... (227)

附录三 德国二战史观教育:20世纪60年代的变革与启示 (238)

导 论

二战后，西部德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更是如何从充满道德和政治灾难的历史中发展出真正民主的政治文化。盟国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对西占区强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为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使其在成立之初即沿着被植入的政治模式运转，而在政治文化方面西德社会则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直至 1970 年代末，民众普遍抱有的“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①的政治心理和态度才有显著改观，联邦德国才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了西方式、参与式的民主政治文化。50 年代选民“被动的臣民倾向”终于被积极的、参与的和有经验的公民素质所取代，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认同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完成了肯尼斯·戴森 (Kenneth Dyson) 所说的德国人的“政治觉醒”。

人们也许可以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不同步性发展”中寻求对这一现象的解答，因为联邦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政治框架远远超前于它被制订时的政治文化水平，西方议会民主制在联邦德国缺少政治文化土壤。而实现二者最终“同步”的因素较为复杂，联邦德国各界，从政府到社会，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从各政党到学术界，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由联邦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系统的、持续不断的民主政治教育 (demokratischer politischer Bildung) 甚为关键。“直至 70 年代，联邦德国是西欧仅有的设置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治沟通过程的国家，它有一个特殊的机构承担政治教

^①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1963, p. 256.

育的责任。”^①这个政治教育的政府机构,就是隶属联邦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总部位于波恩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当代(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在其民主政治教育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早在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由于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②基于此,为铲除纳粹思想遗毒,在民众心中树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正确的“二战史观”,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下,以《基本法》为指导,联邦德国开展了持续、系统的民主政治教育工作。西德联邦议会和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乡土服务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1963年之后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联邦德国正式启动。^③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联邦德国逐步建立起以这一机构为中心的较完善的民主政治教育体系,并依托该体系充分发挥了政治教育在促进联邦德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在经济复兴、反思纳粹、东西方和解、民族统一、欧洲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主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④

对作为联邦德国国家政治教育体系核心组成部分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历史进行研究,显然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本书涉及的1952—1990年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不仅经历了从联邦德国建国到两德统一前的各大历史事件,也涵盖了政治文化在联

① Benedikt Widmaier.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 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7. S6.

②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 Bonn: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002. S13.

③ 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西占区占领当局主导推动的“非纳粹化”和“再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之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渊源。

④ 参见傅安洲:《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述评》,载《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3期。

邦德国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全过程。

通过对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历史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1. 联邦德国为何、如何构建其民主政治教育体系? 2. 在其民主政治教育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遇到了哪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又是如何应对的? 3.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探讨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背后的那些有形的力量和潜在的文化影响因素。本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建构民主政治文化的历史进程,进而探究民主政治教育在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这项研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来源,有助于借鉴其工作的有益经验,提升对政治教育这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实践的规律认识。

德国政治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传统,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政治教育。随着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德国政治教育也长期处于不断的分裂与重构之中。伴随每一次社会政治变革与政治秩序的更迭,德国政治教育都被赋予不同的概念、内涵及功能,经历了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以及联邦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 politischer Bildung)等历史形态。

同样,德国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也较早,“德国是欧洲少有的政治家、学者和其他专家都普遍关注政治教育的国家。”^①自 19 世纪末期起至今,产生了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政治教育学者,代表人物有德国公民教育的先驱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文化教育学派的杰出代表李特(Theodor Litt,1880—1962)和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合作教育”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弗雷德里希·欧廷根(Friedrich Oettinger,1906—2005),“理性教育”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伯纳德·苏特(Bernhard Sutor,1930—)、“冲突教育”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① Geoffrey K. Roberts,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ermany”,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2, p. 556.

Giesecke, 1932—), 以及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 1916—2003)、瓦尔特·加格尔(Walter Gagel, 1926—)、汉斯·京特·阿塞尔(Hans-Günther Assel, 1918—2002), 等等。

在德国, 政治教育是发展十分成熟、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的学术领域, 有关政治教育的著作浩如烟海, 对其进行系统追溯的难度极大, 故选取战后联邦德国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做一学术史上的梳理。这些学者, 有的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建立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①, 有的曾长期担任该机构的学术顾问, 有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出版刊物的撰稿人^②, 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该机构颁布的文件章程的制订工作^③, 而且大多数人的著作都曾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系列出版物出版。因此, 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时期“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20世纪50年代, 联邦德国建国之初, 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tinger)发表的《政治教育的转折点——作为教育任务的合作关系》(Wendepunkt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 Partnerschaft als pädagogische Aufgabe, Stuttgart 1951), 是战后第一本引发较大关注和热烈讨论的政治教育专著。该书对“合作”政治教育的阐述, 汲取了被称为“再教育之父”的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公民教育思想, 特别针对普遍存在于联邦德国社会的政治冷漠与“不合作”态度, 提出用“社会责任”“伙伴关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 为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重建提供精神力量。但是, 恰恰也

① 如李特的《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 被认为“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方案, 也可以看成是新机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和运转的理论基点, 该书也是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出版的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参见 Benedikt Widmaier.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 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7. S8.

② 如 Hans Misselwitz, Bernd Lüdkemeier 等人均曾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出版的著名刊物《政治与现当代史》撰文。

③ 如苏特曾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起草了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起和资助的“联邦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原理与目标”等重要文件。

是“合作”政治教育自身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功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各群体、阶层、阶级之间的价值差异,忽视了对民众基本政治观的重塑和建构。

1957年,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zur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受新兴的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教育”在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强调“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因素的作用,从加强青少年社会体验的角度开展政治教育”^①。同欧廷格相比,斯普朗格并不否认或逃避社会矛盾,而是注重如何引导青少年在对这些矛盾、对立的参与体验之中进一步理解社会发展的曲折性。

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的著作《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Bonn 1961),对弗雷德里希·欧廷格的“合作”政治教育提出了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②。李特认为,“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③。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国家的意义。李特对欧廷格的批评,还在于“合作教育”的主张导致社会学(Sozialkunde)的非政治化,他认为教育应为国家意识服务,即在政治教育中国家必须处于中心位置。可见,在对“合作”政治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李特十分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这不仅在联邦德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也对联邦政府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李特政治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西德政府进一步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行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这

^① Eduard Spranger. *Gedanken zur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 hg. von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2. Aufl. 1957, abgedruckt in: Eduard Spranger: *Staat, Recht und Politik*, hg. von Hermann-Josef Meyer, Tübingen 1970, S. 77.

^② Theodor Litt. *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Bonn, 1961. S. 15.

^③ Theodor Litt. *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Bonn, 1961. S. 16.

样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名字也终于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取代。

20世纪60年代,是联邦德国政治冲突、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极左、极右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极端主义、纳粹主义有所抬头,大学生运动高涨引发社会动荡,联邦德国经历转型的阵痛。如何引导民众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任务。1965年,年轻的学者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Didakt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München 1965)。作为欧廷格的学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老师的政治教育理论,借鉴了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思想方法,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主旨是“政治教育必须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因为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从而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理解和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能力,能够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①。

基泽克的“冲突”教育理论对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为联邦政府和“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采纳。一份1968年的政治教育工作报告指出,“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②

与此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学术界对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激进的文化批判对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发轫于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在政治教育领域也引发了围绕“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

^① Hermann Giesecke. *Didakt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München, 1965. S. 57.

^② Hans-Werner Kuhn. *Politische Bildung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Stand-Perspektiven*. Opladen, 1993. S. 288.